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摆脱了殖民主义羁绊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也曾出现过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时机；但是，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原因，这种有利时机很快就丧失了。本文从美苏国共这三国四方势力对战后中国社会发展政治蓝图的设计及其演变对战后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剖析。一、美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妥协，都希望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统一。这是推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国际因素。二、中共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政协五项协议达成后，中共表示愿意接受英美式的民主宪政，准备走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的方针，不允许中国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当中共在人民的支持下，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后，也就没有必要再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很自然地领导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战后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战后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原因剖析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何仲山

中共上海真奉贤县委党校 张明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摆脱了殖民主义羁绊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也曾出现过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时机；但是，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原因，这种有利时机很快就丧失了。然而，近年来有人认为，抗战胜利后，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进行人民解放战争，那么中国有可能在国民党领导下，走上英美式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认识是对于中国的国情，以及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共两党的建国方针缺乏科学分析的。本文着重在这些方面作些剖析。

一、美苏为战后中国社会设计发展的政治蓝图

战后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有美苏国共四种势力。在这三国四方势力中，国共两方是决定中国政局的基本力量，而美苏两国则是对中国政局产生巨大影响的国际因素。

美国作为战后崛起的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为了称霸世界和在远东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早从罗斯福执政时期，就着手为中国设计了一条符合美国利益的发展道路，即：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以达到削弱中共势力，排除苏联影响，把中国纳入到美国势力范围的目的。

美国政府之所以制订这一政策，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战后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加上美国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大规模地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有一段绝妙的解释，他说：“我认为我们一开头必须认识到我们目前活动的主要中心必须是在欧洲。我们不能平均地向世界各地放枪。我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好放。西欧一旦发生事故，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因此，我们的主要力量必须用于加强西欧的防御和经济。至于亚洲，应该作为防守战来对待，而且不能在亚洲投入真正进攻所需要的那样大的力量。”^①

第二，美国在中国的长期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符合美国方式的代议制政权。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运用他们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走去”。^②为了在前沿国家建立起新的殖民主义体系，美国一方面需要利用那里的旧政权，另一方面又要用美国的民主方式对这些旧政权加以修补和改造，涂上一层民主的色彩。在美国看来，蒋介石政权是一个“一党政府”，缺乏民主精神和民主基础，有碍于美国长期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修改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建立广泛的代议制政府。

第三，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蒋介石坚持一党独裁制度和发动内战的政策，其结果必然被中共所击败。美国政府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马歇尔在其使

^①、^②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15-1950）》，第10页；第6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华报告中写道：“我与蒋委员长及其亲密顾问们的意见不同，我认为他们目前的做法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混乱状况不仅将削弱国民党，而且将为共产党提供一个破坏国民政府的绝好良机。”^①在美国政府看来，“在中国建立由中共统治的政府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②为了避免出现这一结果，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必须作出某些民主改革，以维持这一政权的生存。

第四，既要阻止苏联对中国的渗透，又要避开同苏联的直接冲突，唯一的选择就是设法避免中国的内战。美国政府认为，随着国共冲突的发展，存在着苏联支持中共的危险。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一直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至关键点，美国如果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中共对外关系处于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就有迫使中共不脱离莫斯科轨道的危险。此外，苏联出兵东北，在击败日本关东军之后，仍然驻留东北，并提出某些经济要求，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忧虑和不安。马歇尔一到中国，首先关心的就是苏联对东北有无特殊的意图。这种对苏联的意图及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估计，促使美国政府力求避免中国的内战，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为此，马歇尔不断警告蒋介石，要设法停止冲突，否则，国共冲突越拖下去，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

第五，实现美国对华长期目标的最佳方案，就是采用西欧模式。美国要帮助蒋介石击败中共，并用实力迫使苏联从东北撤退，就必须投入巨大的无限制的人力和财力，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而要放弃和削弱对蒋介石的支持，就意味着美国“在太平洋作战的主要目的的失败”。^③两全其美的政策，就是既支持蒋介石，又不卷入中国内战中为蒋介石而战；最理想的办法，就是通过施展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迫使国共双方都作出让步：蒋介石同意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容纳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中共则交出解放区和军队，从而造成西欧国家对付共产党那样的局面。美国政府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且在当时看来，采用这种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似乎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④

苏联在战后总的战略是，维持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稳住美国，以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愿意同美国达成妥协，同意美国设计的政治蓝图。首先，苏联为了迅速恢复遭受大战严重破坏的国内经济，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其次，苏联急需巩固它在战后所取得的利益和在东欧的地位，也无暇与美国争夺中国；再次，苏联低估了中共的力量，认为中共根本没有能力统一中国。早在1945年5月28日斯大林在同美国总统顾问霍普金斯和美驻苏大使哈里曼会谈时即断言：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没有哪个共产党领袖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中国”。^⑤第四，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的可能性，斯大林曾对人说过：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基于上述几个因素的考虑，苏联力求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个缓冲区，希望战后中国能出现一个中立的政府，并把这种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中立保证，苏联再三表示只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①《马歇尔使华》，第21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161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③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80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④《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02页，三联书店，1977年版。

⑤《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85页，三联书店，1977年版。

斯大林曾向霍普金斯明确表示，他将尽一切努力促进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这种领导在战后还应当继续保持下去。斯大林并向美国许诺，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①

美苏两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妥协，这是造成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短暂和平局面的国际条件，也是推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国际因素。

二、中共准备走迂回曲折的道路

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出的政治方针。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所组成的临时的民主联合政府；一种是在抗战胜利后，经过自由选举所产生的正式的民主联合政府。对后一种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毛泽东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②可见，七大的方针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但是，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是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二是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政府等。本来，中共认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③但是，8月22日，斯大林给中共中央来电，认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并提出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制定了新阶段党的策略方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首先，他认为随着抗日战争阶段的结束，中国已进入到和平建设阶段。他指出有四种因素，能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在内外压力下，有可能避免内战，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并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其次，他提出准备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他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④会议经过讨论，将《目前紧急要求》修改为《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今后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8月25日晚，在接到蒋介石23日发出的第三次电邀及魏德迈的再电邀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同志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开会，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在重庆谈判及之后的政协会议期间，中共实际上是按照毛泽东规划的政治目标去努力的。这个政治目标比七大后退了一步。中共在这一时期要争取实现的政治制度是：在保持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51页，三联书店，1971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7页。

^③《周恩来年谱》第61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实行各阶级的联合统治。这是联合政府中最低层次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把这种形式通俗地叫作“独裁加若干民主”，其性质是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政府。中共准备把这种政治制度作为向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

重庆谈判结束后，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使内战不断升级，但是中共仍然真诚地争取和平，并相信中国有可能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及我党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要求全党认清这种形势，“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①

是年底，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新形势：（1）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2）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卓著的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表明美国政府对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视；（3）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一方面宣称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提出要召开中国各主要党派的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4）12月2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就中国问题发表公报，提出中国有必要停止冲突，组织有各党派参加的国民政府，并在它领导下建立统一与民主的中国。中共认为，上述变化表明争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和平建国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马歇尔的调停下，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在政协会议上，经过中共和民主党派代表的努力，国共双方都作出一定的让步，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等5项协议。政协协议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保证了各党派能够公开参政。政府组织案事实上承认了联合政府，规定各党派可以参加政府；和平建国纲领规定，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军事问题案确定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同步进行，保证了人民军队的地位；而这5项协议中，最重要的当数宪草问题协议。国民党原先搞了一部《五五宪草》，按《五五宪草》的规定，要设置五院制和一个庞大的国民大会来行使创议、复决、选举、罢免这四个直接民权。这样，国家既没有行使主权的议会，政府实际上亦不向议会负责，这种制度最适宜于个人独裁。中共代表批评《五五宪草》规定的五院制“事权分散”，实际上无权，而大权独落于元首一身，极易“流于个人专制之弊”，因此提出“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所行的国会制度，其经验很可采取”。^②民盟代表亦极不满意，认为这部宪草是“人民无权，总统万能。”^③经过中共和民盟双方代表的共同讨论，最后提出了十二条宪草修改原则，其主要内容为：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即由选民直接行使四权，使国民大会名义上存在，而在实际并无具体机构和活动，“这样便把妨碍英美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④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得提

^①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55页。

^②、^③、^④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421-422页；第722页；第732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请总统解散立法院”，“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各民主国家之议会”等等，这样在保全五权宪法的名义下，注入了英美宪政的内容。民盟秘书长、政协宪法审议委员之一罗隆基曾说：“假使这些修正原则将来经过宪法审议委员会的工作，都把它列入宪法草案中去，那末，英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不就整套搬到中国来了吗？”^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宪草修改原则不利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而有利于人民。规定国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从而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采用国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体，使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规定省自治并制定省宪，则保护了解放区的民主制度。因此，中共同意这些原则，并作好了实行宪法，在宪政中作合法斗争的准备。政协闭幕的当天（1月31日），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谈中曾说：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目前不打算将它付诸实现。^②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了重大结果，“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③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2月6日，周恩来在回答美国《读者文摘》记者乌特莱的提问时，明确指出，在民主宪草原则问题上，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这是中共在政协上作出的基本让步之一。^④

中共之所以愿意接受英美式的民主宪政，准备走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是因为：

第一，尊重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这是中共制定政策和策略的根本依据。周恩来曾说过：“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人民要和平。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方法。”^⑤

第二，有利于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从抗战胜利到1945年底以前，鲸吞人民胜利果实和护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斗争，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内容。在这场斗争的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在远离前线的大后方，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中共军队则利用其一直活跃在敌后，包围着日本占领区战略要地的优势，迅速地扩大了解放区，加强了华北、华东各解放区的力量，在东北实现了战略展开。但不久，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将80万军队运送到内战前线，抢占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和大量战略要地，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便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虽然中共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但由于美军在华北登陆，苏联为履

①《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723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②《周恩来年谱》第64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31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

④《周恩来年谱》，第64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⑤《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行中苏条约而决定让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大城市和中长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仅无力独占华北和东北，而且此时控制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也有得而复失的可能。因此，实现国共双方无条件停战，使中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对于巩固新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利用英美式的民主宪政，以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局面。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于利用旧民主的形式，争取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是很重视的。早在1944年3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参加宪政运动发表讲话时就指出：“在大后方，要利用旧民主，要强调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①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和平民主的可能，中共决心抓住时机，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实现政治民主。周恩来曾对马歇尔说：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象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②正是反映了中共的这种愿望。

第四，受西欧模式的影响及苏联的压力。西欧的法国共产党等在战胜法西斯后，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联合政府，这种现实对中共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影响。毛泽东在1945年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希腊人法国人得到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收到苏联友人转来的苏共中央意见，认为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估计。^③苏联大使也明确表示，中共应准备学习法国的经验，逐步把主要工作转移到争取群众方面来。政协会议的成功，使中共认为已经找到了一种确实可靠的，能够保护党和人民利益不受损害，并且能够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真正实现政党政治的民主形式，即是说在中国出现了走法国式道路的可能性。

第五，为争取新民主主义前途所作的一种尝试。尽管政协决议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相距甚远，但是中共认为，如果真的按照政协决议做下去，中国一定会朝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按照政协决议，解放区可以运用地方自治、有宪法等规定，保持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而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改组政府，实行英美式的宪政，取消特务，使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转向旧民主主义，这也是很大的进步。诚如周恩来所说的，利用旧民主主义的形式，充实以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经过斗争，“使各种有利条件完全成熟，争取新民主主义胜利的前途。”^④

三、蒋介石坚持独裁专制，不允许中国走 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允许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官僚垄断资本。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通过“接收”沦陷区日伪财产，

①《周恩来年谱》第57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732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③同①第638页。

④《周恩来年谱》第60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又从美国的大量财政援助中肥私。因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在抗战时期已经扩张的基础上，急剧地膨胀起来，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利益，在政治上必然顽固坚持一党专制、个人独裁。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又会同意政协决议呢？从当时的情况，一是蒋介石对宪草问题大意了。据当时任政协秘书长的雷震说：“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只把宪草小组会议纪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纪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①二是同美国的压力有关。战后，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提出2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三年为期，第一期要求6.5亿美元。但是，美国“全国顾问委员会”于1946年1月作出决定，只有“当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况发展到适合于通过大量贷款援助该国时，进出口银行将批准这样一项贷款，但只能在逐项审批的基础上使用。”^②马歇尔要求该项贷款在美国政府提交国会以及与国民党政府开始谈判的时机均由他决定，以此作为压蒋接受政协决议的一个法宝。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代表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引起马歇尔的不安，他决定亲自出马，向蒋介石施加压力。1月22日，马歇尔悄悄拜会了蒋介石，向蒋递交了一份由他亲自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草》，要求把国民党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他警告蒋介石：“有两个因素使他（蒋介石）绝对有必要与共产党尽早就建立统一的政府和军队问题达成一项协议。第一，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很容易受到俄国小规模渗透的危害，从而加强共产党政权，逐步削弱国民政府在西北和满洲的地位；第二，美国陆海军力量显然不能继续长期在中国驻留。”^③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勉强接受了政协决议。事后，当国民党将领张发奎询问蒋介石为什么要与中共妥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蒋公开承认：“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观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上原因，所以不能不举行政治协商会议。”^④

但是，国民党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实行“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的方针，^⑤即由经济垄断而政治独裁，由维护政治独裁而发动内战，由为了在内战中取胜而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于触动其专制独裁统治的任何方案，它都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反对；万不得已时，也只是在表面上接受，过后便疯狂地进行反扑，恶狠狠地将它撕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政协决议的。政协会议期间，陈果夫即致函蒋介石：“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⑥为审议政协决议，国民党于1月31日下午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国民党内的—批顽固分子在会上顿足嚎叫，大哭大闹，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12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蒋介石任他们大吵大闹，一言不发。

①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733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19-120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③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51-152页。

④ 《文史资料选辑》总115辑，第20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⑤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0页。

⑥ 徐咏平《陈果夫传》第935页，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版。

最后，蒋才吐露真情，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①蒋介石的潜台词说得十分清楚，准备一有机会就推翻这个草案。

当天晚七时开政协闭幕会，蒋介石亲自主持，把五项决议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唯独对于宪草加以保留。蒋说：“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②2月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声称：有关宪法草案的协议，只是供5月份召开的国民大会“参考”，并由国民大会来决定。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字眼，都表明蒋介石是不接受宪草修改原则，并准备设法破坏之。就在政协会议期间，蒋介石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政协会议刚刚闭幕，他又一手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反苏反共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营业部等事件。在特务散发的传单中，攻击矛头主要也是针对宪草修改原则的。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带头发难，反对政协决议。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表示：“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提出了五条修改宪法草案的意见：（1）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从而彻底否定了政协会议制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及其他民主原则。

3月20日至4月2日，国民党又单方面召开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在4月1日的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长篇报告，再次表示不承认政协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他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那是“决不能承认的”。④对于动摇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制度的宪草修改原则，蒋介石尤为不能容忍，他说：“在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案中，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一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⑤为了同宪草修改原则相对抗，他公然抛出了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约法，声称：在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尚未颁行之前，“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众所周知，训政时期约法的核心是维护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蒋抛出训政时期约法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承认和接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此，他讲得十分露骨：“我们国民政府就是根据训政时期约法而成立的，而且根据训政时期的约法而行使其职权。倘若宪法尚未颁行，而约法先行废止，中国就没有合法的政府，国家就要陷于无政府状态。”⑥为了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6月26日，蒋介石公然发动全面内战，彻底撕下了和平民主的假面具。11月，又不顾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召开制宪国大，通过了一部“人民无权，独夫集权”的蒋记宪法，从根本上堵住了中国走英美式资本主义的道路。

①、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731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③引自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671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⑤同上，669第页

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670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结 束 语

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新形势，但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从根本上说，国共两党的对峙和斗争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方针，拒绝实行任何政治、经济改革；又由于它掌握着全国政权，控制着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资源，还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力量对比上都比中共占有很大的优势。这样，尽管中共顺应民心，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并贯彻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准备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通过和平的政治斗争来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但是，中共的这种良好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还由于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民族资产阶级鼓吹的中间道路遭到破产，因此，等到中共在人民的支持下，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后，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很自然地领导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战后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根本原因，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